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

——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

本刊记者

鲁品越，男，1949年生，安徽芜湖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现任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首批上海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名师”，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突出贡献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研究”首席专家，先后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发表文章数百篇，出版专著10部，译著2部。著作获教育部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两项论著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著作《〈资本论〉与当代世界》列入国家出版基金，著作《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列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这在党的中央全会和党的重要文件中属于首次，“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大亮点，是党的理论创新，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①。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论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时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② 总系统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显著特征。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我们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老师。

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的学理内涵

▲（采访者简称▲，下同）：鲁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总系统观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显著特征。请问这种总系统观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其产生条件是什么？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条件下，领导14亿多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依据这一思想所作出的每个

① 韩保江主编：《“十四五”〈纲要〉新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5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0页。

重大决策，都必然将对全中国乃至全人类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系统性影响。中国决不能像世界上某些国家那样，对于执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短期利益所驱动而随风起舞。那种短视的执政行为非常容易陷入战略被动，甚至导致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因此，在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作为14亿多人民的世界大国的领导核心，必须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发展脉搏，进行总体筹划布局，既抓住根本，又精准应对，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正是应我们党的历史使命和新时代的历史召唤而产生的。

同时，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的产生还需要有主体条件，这就是领航掌舵者具有站在当代人类历史发展的道义制高点与真理制高点的雄才大略。习近平从社会最基层的插队知青到国家最高层的领导人、从地方各个层级的地方领导人到整个国家的主政者，深知国情民心，他的深厚的人民情怀、丰富的执政经验、高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渊博的学识、执掌全局高瞻远瞩的眼光与能力，是治国理政的总体系统观能够产生的主观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时代召唤与主体境界，习近平指出：“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①“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做到相互促进、齐头并进，不能单打独斗、顾此失彼，不能偏执一方、畸轻畸重。”^②这种总体系统观充分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证明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正确性。这是我们党的“两个确立”（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的现实依据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③请问总体系统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具有怎样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含有两大思想要素：一是主体价值观——这就是人民至上，在方法论上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二是客观规律观——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理所当然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两大要素，在新时代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发展到新的高度，总体系统观是新的高度的表现之一。

唯物辩证法是宇宙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但并非一切事物都是总体系统。一盘散沙、无机的物质堆积并非系统。它们的运动也具有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但尚未上升为系统规律。要使事物成为整体系统，尤其是像生命与社会这样高级的整体系统，必须在围绕中心目标的组织之下才会形成。例如，每种动物之所以会形成整体系统，是因为它以维持其生命的生存和繁衍为中心目标，并且有实现这一目标的组织体系，如此才能将其中的物质材料组织为总体系统。目标越明确，实现目标的组织体系越成熟，事物的总体系统性便越强。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一旦没有中心目标，没有实现中心目标的组织体系，人类社会便会沦为半系统，乃至一盘散沙。所以总体系统观是关于高级形态的事物的唯物辩证法，是价值目的与唯物辩证法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以人民为中心，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由此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规律，将14亿多中国人民组织为充满活力的总体系统。

▲：由此可见，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学理哲理”。据您的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6页。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③ 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

理解，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时代化的？

●：其一，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统领，形成其理论高度。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名言：‘每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他接着解释了“统一的整体”在方法论上的含义：“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①这种“统一的整体”就是“总体系统性”。一切事物的性质，包括人的本质、社会的本质，都不是既成的抽象物，而是在该事物与总体的内在联系中生成的。习近平的总体系统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上述总体系统观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他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坚持唯物辩证法，就要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他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两大部类必须保持一定比例关系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②。习近平又以毛泽东、邓小平用唯物辩证法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一系列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思想的生动事例，说明了系统方法的正确性与重要性。在继承的基础上，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总体系统性思想推向了当代新境界：主张世界是事物在相互联系中发展的总体过程，将整个世界与整个人类社会看成一个在内在联系中不断发展的总体系统，更将14亿多人口的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看成在实践中不断生长的伟大系统，创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总体系统的思想，由此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总体系统观的新发展。

其二，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总体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新时代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扎根于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传统和中国人民心理结构，由此形成其历史深度，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奉行个人主义范式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奉行“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主张天理与人伦相统一，而其基础是朴素辩证法的宇宙生成过程，宇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有机整体。著名学者牟复礼、陈来等人指出：“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主张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宇宙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这个自生的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③这一有机论哲学思想渗透在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例如表现在中医思维方法中。在社会观上，表现为奉行“家国一体”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念，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因此，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朴素的总体系统性观念成为连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精神通道，是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文化基因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深入地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也鲜活地表现在新时代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中，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贯通的精神通道。正如学者所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蕴含着国家治理的智慧和力量……为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成为习近平提出系统思维的文化支撑。”^④习近平总体系统观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传统，形成其扎根于中国人民心理结构的历史深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

其三，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总体系统观吸收和体现了当代系统科学新成就的哲学思想，由此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7、56页。

②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

③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页。

④ 王英、韩庆祥：《习近平系统思维的生成逻辑》，《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2期。

形成其现代科学精度，并且用来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新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我曾经在拙作《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中详细阐述下列系统科学思想：近代经典物理学奉行的是个体主义的机械论哲学，在20世纪遭遇危机^①。从危机中诞生的新科学理论与新兴科学越来越把世界看成整体系统的生成过程。相对论、量子论、宇宙大爆炸理论、凝聚态物理理论、非线性物理等一系列现代科学成果都以系统思想作为其哲学基础。到了20世纪后半叶，作为新兴交叉科学的系统科学，如分形几何学、非线性系统论、混沌理论等异军突起。这些系统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当代科学中的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些系统科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可以概述如下。

第一代系统科学以“老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工程理论）为代表，其主题是研究既成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运行规律。主要哲学思想是：总体大于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总和，具有各个部分所没有的总体性质；各个部分之间通过信息流、能量流和物质流产生相互联系，由此形成系统结构；通过原因与结果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控制论机制，例如通过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系统的稳定，等等。这种控制论思想广泛地体现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决策中。

第二代以“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与混沌学理论等非线性系统论）为代表，其主题是研究系统本身的生成过程（又称“自组织过程”）。其主要机制是：系统在相互作用中，某一组织模式通过非线性的正反馈过程不断吸收环境中的物质能量而不断生长扩展，其中某个组织模式通过与其他模式相竞争，最终生长为整合整个系统的组织模式。这个过程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对这个复杂的组织过程的不同机制进行研究，产生了各种自组织理论，它们反映了复杂的自组织过程的各种不同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本质上是对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系统结构的生成机制的科学认识与实践把握，因而充分吸收了上述系统科学中蕴含的哲学思想精华，并且用于解决国内国际新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而现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科技革命，将整个世界联结成一个数字化的整体系统，从而为整体系统观提供了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与数字科技、数字经济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系列体现总体系统观的思想理念与政策举措，实质上是建立在数字科技基础上的。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上述反映时代精神与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兴系统科学、新兴数字科技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② 这里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包含了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运行机制，也包含着系统的生成机制。这不仅表现在其宏大深刻的理论中，也表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武汉抗疫战与上海防疫战，应对中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领导脱贫攻坚战等过程中，对整个系统的运行机制与发展过程的精确把握，可以说是现代系统科技的范例。所以，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成果。

▲：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学理内涵如此丰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是人类优秀的思想理论与文化的结晶。那么，它在治国理政实践上，主要体现在哪些层面？

●：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第一是实践主体的组织方式上的总体系统观，产生了各

① 涉及自然科学知识太多，此处不详述。参见鲁品越：《深层生成论：自然科学的新哲学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个层次的人类主体系统的“共同体”理念；第二是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上的总系统观，产生出治国理政的经纬交织的总系统框架，由此产生了“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等一系列主要内容；第三是各个层次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的总系统性，产生出体现总系统性的决策过程与政策体系。这三个层面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在实践和理论上将其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实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原创性贡献。

二、共同体理念：实践主体的组织方式上的总系统观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您说的这三个层面的总系统观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首先，实践主体的组织方式上的总系统观的含义是什么？

●：习近平提出过一系列的“共同体理念”，我认为其中作为主干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由这三者衍生出其他各种共同体理念，它们共同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在实践主体的组织方式上的总系统观。

人类历史是人类为了世代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历史。为此，人类必须进行两大实践活动：一是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创造出适合人类及其后代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环境；二是进行社会组织活动，把人民组织成社会共同体，以共同创造这种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个人是无法独立创造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总之，人类必须组成各个层面的共同体才能通过有组织的共同活动，使人类生存和发展下去。

▲：那么，如何组织与治理社会共同体是每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正因为组织社会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所以社会的各个阶级与阶层都争夺这个共同体的组织权与治理权。由此产生了本质上不同的两大类社会共同体的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

其一是少数权贵势力为了占有人民创造历史的成果而组织和统治社会共同体，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利益。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最早出现的是等级制社会共同体，它从制度上把人划分为权贵集团与平民百姓两大等级，由此形成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权贵集团统治普通民众的等级制社会治理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后，产生了资本统治的社会共同体：掌握社会关键经济资源的各个垄断资本集团，打着“个人自由”的旗号，通过多党选举的程序分裂人民，争夺民众选票，进而通过由此选举出的行政权力机构与议会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博弈，以形成资本力量之间的动态利益均沾，实现对社会共同体的统治^①。而在国际关系上，垄断资本集团利用其拥有的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等，推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与统治，产生霸权主义世界秩序。这样的社会共同体和国际秩序，最终必然导致日益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与国际两极分化，使人类走向分裂和危机，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寻求将人民组织为社会共同体的新方式。

其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全新的社会共同体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它不以少数权贵集团、垄断资本集团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由党领导人民，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组织起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共同体。由这种组织方式和治理方式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体现了人类历史本身的发展目的——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使人民成为社会共同体的当家作主的主体。这种价值观的根本变革，必然产生与个体主义相对立的“总系统观”。在治国理政方法

^① 参见鲁品越：《西式民主幻象与“资本的民主”》，《光明日报》2021年10月8日。

论上, 首先要求以人民为中心, 把各个领域和层级的人民组织起来, 形成各个层次的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目标的社会共同体, 由此实现社会组织形态上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是站在这样的价值制高点, 习近平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观念、基本方法和根本途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 那么, 您认为, 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共同体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

●: 这些共同体中最根本的主要有三大共同体, 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根本使命, 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中具有中心地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以掠夺他国财富与利益为手段, 恰恰相反, 是与世界所有国家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 共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其实现路径, 这是习近平提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共同体理念,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得益彰。而这两大社会共同体, 必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自身得到生存和发展, 因而必须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否则人类社会发展无法持续。所以这三大共同体形成主干, 衍生出其他各个层面的社会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方面有一系列意义深远的提法与思想, 在此不作详论了。

▲: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如何形成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意义是什么? 请谈谈您的看法。

●: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主体。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再次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①, 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民族是按照人们共同的政治文化基因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民族是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农耕民族与塞外的游牧民族通过贸易、人文交流、战争、战后治理、通婚等各种途径,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具有共同政治文化基因的社会共同体, 其中各个民族都对中华文化基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发生过冲突与战争, 这些事实用血的教训证明了: 汉族与少数民族必须结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生存和发展下去。所以从历史史实中我们看到: 历史上每一次冲突和战争之后,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不是彼此割离, 而是融合更深, 更加不可分离, 从而使中华民族的统一大国的版图不断扩大, 人口不断增多。尤其是近现代在反对“三座大山”统治的斗争中和新中国建设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形成的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心的红色文化基因, 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更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凝聚力, 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强大精神纽带与组织纽带。

正因如此,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深化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 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各民族团结和谐, 则国家兴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 反之, 则国家衰败、社会动荡、人民遭殃。党中央强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的重大决策, 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② 而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各个民族之间关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是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引下, 我国通过伟大的脱贫攻坚战, 通过堪称世界奇迹的特高压电网建设、通藏和通疆铁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5G 通信网络系统建设等一系列基础建设, 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 将整个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年, 第39页。

②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人民日报》2022年3月6日。

中国土地上的各个民族铸成一个伟大的总系统。同时，坚持“全国一盘棋”来制定全国的区域发展战略。这些发展战略之间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互配合，在发展我国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具有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理念。是否可以从总系统观上谈谈您的看法？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层面上的人类主体的总系统性。习近平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这一理念：“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①这是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高瞻远瞩的科学判断，站在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的道义制高点和真理制高点上，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由此确立的全球治理的总系统观，努力倡导国际关系上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各个国家都无法离开他国而独善其身。任何一个国家或国际集团在争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不能以伤害他国根本利益为前提，否则不仅在道义上站不住脚，而且必然产生“回旋镖效应”，在伤害他国的同时伤害自己，最后的结果是各国矛盾越积越深，甚至会导致国际社会的分裂，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冷战之后美国相继发动了多次战争，不仅伤害了他国发展，而且对美国自身来说，只是养肥了军工复合体，加剧了美国国内的两极分化。相反，奉行建构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在给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机遇的同时，也使自身的综合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两种全球治理方式，高下立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秩序取代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已经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趋势。

▲：习近平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请您从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的角度，谈谈您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看法。

●：社会共同体必须依靠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以建立“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前提。人与自然构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总系统，而从价值目标上说，建构这样的总系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因为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人，其手段也要依靠人。习近平指出：“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要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目的，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遵循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的生态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价值目的与遵循总系统的客观规律的统一，形成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②生态系统建设的总体规划、遵循生态循环来发展各个产业，建立循环经济等，正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总系统观的体现。

以上三大“共同体”之间内在联系，构成不可分离的整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命运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同时，只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伟大复兴才能得到实现。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直接关系到全中国全人类的命运。习近平指出：“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②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方还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持续造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在实现全球碳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①由此可见，必须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才能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三、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总体系统性：治国理政经纬线

▲：组织与建构上述社会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带领中国人民进行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为此需要制定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总体系统观。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总体系统观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证。没有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将会沦为一盘散沙，而在国际资本力量的渗透下，必将陷入严重分裂，任何总体系统的施政方案都将沦为空谈。在新时代，要坚持党的领导，“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②。这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体系统观的必然要求。

▲：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实施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突出表现在哪些方面？

●：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总体框架的根本价值目的。这一主观价值目的必须通过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由此必然发生主观价值目的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在新时代，这一矛盾表现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国际关系上则表现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霸权国家妄图打压和阻遏中国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都现实地表现为新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实践过程则要从总体系统观着眼，否则将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不可能得到解决。习近平清楚地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③这就是治国理政总体框架上的总体系统观。

▲：那么，如何从总体系统观角度来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呢？

●：习近平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框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针对主要矛盾发生的空间领域的总体框架。主要矛盾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它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五大建设领域：在经济领域表现为生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政治领域表现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的矛盾，在文化领域表现为反映人民意志的先进文化与腐蚀人民意志的西方文化渗透的矛盾，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人们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的要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在生态文明领域中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相互联系、相互纠缠，构成极其复杂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4月23日。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3日。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的矛盾总体，它们共同形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高瞻远瞩，在提出“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之后，接着指出：“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①由此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使五大建设协同发展。这是总系统方法在治国理政的宏观领域的表现。

这五大建设内在联系，相互贯通，形成“一体”。经济建设是其他四个方面建设的基础，而经济建设本身又必须由政治建设来保证，同时需要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来支撑，否则无法健康进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由此构成内在联系的“五位一体”循环链，其中经济建设是基础，政治建设则是其控制中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具体化、科学化、系统化、实践化了，这是对唯物史观的巨大发展，是用治国理政的实践语言书写的最新最活的历史唯物主义。

随着社会实践日益复杂，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衍生出三大重要的交叉领域：安全领域、国防领域、外交领域。安全底线是五大建设能够进行的前提，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生态安全、数据安全等。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全面协调解决安全问题，产生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而国防安全尤其重要，直接关系到国家存亡安危，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加强国防建设，产生了习近平强军思想。通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于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总系统上的横向逻辑结构。

▲：这就是说，“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解决各个领域的主要矛盾的总体布局。那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解决主要矛盾中的作用是什么？

●：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解决方法，要求我们遵循总系统性的实践规律，否则将会“按下葫芦浮起瓢”。习近平总书记总览全局，发现了总体上全面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这就是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目标方向。新时代主要矛盾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各个领域表现形式错综复杂，我们不能被一时一事的各种挑战所惑而“随风起舞”，要始终不忘解决矛盾的根本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把我们遇到的每个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结果，作为新的伟大征程中的一个环节，避免作出缺乏战略眼光的短视决策。

——“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主要矛盾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因此其根本的解决途径是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指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②因此改革必须深化。中国社会是个整体系统，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行为准则。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01页。

决主要矛盾，必然要运用行政权力就有可能产生不按照法制规矩行事的不当施政行为，会在全局上导致政府行为混乱，人民群众的行为也因此而无法纳入法治轨道。因此从整体社会的长远利益着眼，要求所有政府行为与民众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形成法制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法治水平。

——“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保证。要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我们党必须时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①一旦自我革命稍有放松，就会产生以权谋私、官官相护的特权集团，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悲剧就会在我国发生。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进行的伟大的反腐败斗争，为世界政治史上所罕见，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一是全体人民都要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留死角；二是“五位一体”的全部领域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留空白。这正是系统总体性的体现。

▲：因此，在党的领导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共同构筑了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总体框架。是这样吗？

●：是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在总体框架上的总体系统性，表现为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治国理政经纬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成治国理政的“纬线”，它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治理领域科学地确立为由内在联系的五大领域构成的总体（安全、国防、外交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交叉领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经线”，它渗透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二者内在交织，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体系统框架，为我国新时代治理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奠定基础。

这种总体系统构架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的现代辩证系统论。它克服了黑格尔把整个世界都纳入绝对精神的一维历史发展的“单维历时性”的缺陷，同时也克服了形而上学把整个世界都纳入“静态同时性”的缺陷，建立起时空融合、不断生成和不断发展的总体系统。“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不断推进，必然不断产生出新事物、新制度、新文化、新成就，产生出人类文明新形态。

正是这样的总体系统思维与我国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如何在实践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主要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其中主要内容与结论，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上，这需要专门论述，这里不作详论了。

四、决策过程与政策体系上的总体系统观

▲：如您所述，社会共同体及其组织方式体现了新时代人类社会主体结构方面的总体系统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交织的经纬线，体现了施政总体框架上的总体系统性。那么，如何将这种总体系统性观念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呢？

●：概括得非常好！我们不仅需要上述总体战略上的总体系统观，还需要决策者具有总体系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4页。

统观的思维方法与治理能力，制定符合总系统观要求的政策体系。这就是决策过程及其产生的政策体系上的总系统性。

▲：那么，决策过程上的总系统性表现为哪些方面？

●：这是非常巨大的难题，根据我粗浅的体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决策过程的总系统性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决策过程上，要实现胸怀“国之大者”与具体事务决策的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一定要胸怀“国之大者”，用唯物史观看清历史大势，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进行科学决策。“国之大者”归根到底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这一复兴过程必然伴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①。习近平经常提醒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强调“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②。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观在决策方法上的体现。

胸怀“两个大局”与“国之大者”，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如何具体地看待问题、作出决断的行之有效的总系统方法。它要求领导干部要把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与相应决策放在两个大局的总体联系中的某个环节来考察，因为“只有在把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③。例如，进行脱贫攻坚的具体决策，要把脱贫攻坚战放在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放在世界产业革命的历史潮流中，才能制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合理标准，而非只图一时政绩。在世纪疫情面前，要把防疫抗疫的斗争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考察，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的伟大意义，分析所在城市对整个中国社会总体的影响，权衡利弊，才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科学决策。

第二，在决策过程上，立足于中国的总体环境的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的新制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辩证统一。系统科学的新成就强调系统的生成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吸收了其哲学精华。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④。这一科学判断不仅适合于多党合作制，也适合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从实践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各项战略决策，都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扎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的辩证统一，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13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页。

④ 参见《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6页。

第三，在决策过程上，实现总体上的“顶层设计”与具体实践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种播种于中国土壤以生长出中国制度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与纠错，通过自我学习而不断生长的过程，这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科学性所在：不是用预先规定的制度框定现实，而是在小范围内试验，在纠错中成长，在推广中不断完善。这正好与现代系统科学所主张的组织模式在系统中扩展的科学理论相一致。这是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

“摸着石头过河”并非盲目摸索。邓小平在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同时，也给出了前进的大方向——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这实质上是尚未定型、尚未系统化的顶层设计，否则就会导致混乱无序。而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将这个方向具体化和制度化，从而形成具有总体系统性的“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要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①

总体系统观要求“顶层设计”从“摸着石头过河”中来，又回到“摸着石头过河”中去，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在落实“顶层设计”时不能机械照搬条文，而是用来指导“摸着石头过河”的具体实践，在复杂多样的条件下得到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我们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②

▲：那么，在由这样的决策过程所产生的政策体系上，总体系统性表现为哪些方面？

●：这同样是非常巨大的难题，根据我粗浅的体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全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③，这是总体系统性思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上的总体系统观的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体现，是发展的灵魂，必须贯彻于全部发展过程。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则是着眼于总体系统观，根据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总体国情，主动建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经济运行体系。

第二，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战略布局，实现全国发展战略统筹下的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战略，这是总体系统观在规划、组织和协调区域发展战略上的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回顾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指出，我国“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④。在谋划我国未来发展战略时强调，“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⑤。这些都是发展战略布局上总体系统观的宏伟体现。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8页。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8、31-32页。

第三，总体应对各种挑战与问题的“政策组合拳”，这是总系统观在解决面临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所作出的决策上的体现。根据总系统观进行的决策，不是零打碎敲、支离破碎的单个决策，而是全面系统的总体决策，各项决策之间相互协同、相互配合，以增强决策效果，堵塞决策漏洞，防范决策负效应。由此得到各个相互配套的决策组成的政策体系，这就是“政策组合拳”，目的是实现各项政策之间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应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复杂事件时，这种“组合拳”尤其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组合拳”来应对我们面临的各种挑战与问题，防止单一政策引起的偏颇，推动整体事业的健康发展。以下是政策组合拳的生动案例。

——反腐倡廉组合拳：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党推出了一系列“组合拳”，建立了一系列“三不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从“八项规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到建立严密的党内党外监督体系等制度（包括常态化巡视制度）的“组合拳”，等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组合拳：面对由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产能过剩所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经济政策体系。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由一系列政策组成的组合拳，包括“三去一降一补”等极其丰富的内容^①。

——脱贫攻坚政策组合拳：在脱贫攻坚战中，提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联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精准滴灌各个领域政策组成的一整套政策组合拳。习近平指出：“我们始终强调，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我们打出了一套政策组合拳，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真正发挥拔穷根的作用。”^②

——抗疫防疫“政策组合拳”：包括核酸筛查、隔离措施、交通运输、人民生活物资的供应保障、就医就急等事件处理、复工复产等一系列相互配合的政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使之相互配合而形成系统化的政策组合拳。

同样，在环保治理、金融管控、应对美国无理挑衅、应对“港独”“台独”“疆独”等事件中，我们都按照“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重要科学特征。而这些“政策组合拳”本身又相互配合、呼应，形成作为总系统的新时代政策体系，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由此可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性的灵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没有这样的灵魂与目标，在理论上无法形成方法论体系的总系统观，在实践上无法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系统性。由社会共同体的实践主体的总系统性、由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形成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纬交织的宏观治理方略的总系统性，以及在此宏观布局下决策方法与政策体系的总系统性，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方法论的总系统性，这是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新成果。

（编辑：黄华德）

^① 参见鲁品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②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518页。